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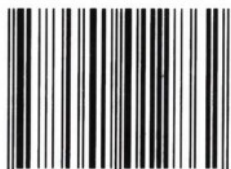
好川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出版社



ISBN 7-5010-1286-5



9 787501 012862 >

ISBN 7-5010-1286-5

K·542 定价: 270.00 元

90037451

好川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编
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主编 王海明 副主编 孙国平



90037451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1

PDG

封面题签 鲍贤伦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编辑 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川墓地/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1.12

ISBN 7-5010-1286-5

I. 好… II. ①浙…②遂… III. 墓葬 (考古) - 发掘报告-遂昌县 IV. K878.8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40746 号

好川墓地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遂昌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五四大街 29 号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东莞新扬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1/16 印张: 32 插页: 1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 200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5010-1286-5/K·542 定价: 270 元

HAOCHUAN CEMETERY

(With Abstracts in English and Japanese)

by

Zhejia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The CPAM of Suichang County

Cultural Relics Publishing House
Beijing • 2001



序 一

毛昭晰

1997年5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军同志告诉我，浙西南山区遂昌县县城附近的好川村发现了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墓葬群，从出土的器物看，可能属良渚文化晚期。这一消息对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在我的记忆中，浙西南地区好像还没有发现过史前时代的遗址。好川墓地的发现，对浙西南的考古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如果说好川的器物属良渚文化晚期的话，那么它和良渚文化有什么关系？这是许多研究史前文化的学者都很关心的。

5月20日、21日，我有机会到好川进行考察。那时，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王海明、孙国平、刘斌、蒋卫东、郑建华等同志已经在那里工作多日。发掘工地上还有省文物局考古培训班的一些学员，他们在那里边学边干，劲头十足。同时，良渚工作站的工作人员在站长芮国耀带领下也到这里助战。我在这里见到了许多熟悉的同事，感到十分高兴。王海明等同志一面陪我考察工地，一面向我介绍发现和发掘的经过，还带我看了许多从墓地里发掘出来的陶器、玉器等文物。

那次考察，我印象较深的首先是好川墓地的地理环境。它在仙霞岭南麓一个谷地中的小山岗上，周围群山环抱，和浙江以前发现的河姆渡、良渚、马家浜等许多史前遗址很不一样。在这个被称为岭头岗的小山岗上发现了80座墓葬，说明其附近一定有一个史前的聚落。另一个较深的印象是墓葬中发现的几何形曲面玉片。玉片抛光极好，制作精湛，特别是其形状和良渚文化玉璧上发现的三重台阶形（祭坛形）符号十分相似，甚至可以说一模一样，这就很自然地使人考虑到好川墓地与良渚文化的关系。但从墓坑的形状看，好川墓地的墓坑，其平面的长度与宽度相差不多，几乎成正方形，这和良渚文化长方形的墓坑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现象是不是可以说明好川墓地所反映的是一种受良渚文化和其他文化影响的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呢？带着许多疑问，我离开了遂昌。

隔了不久，我又到好川去了一次。那一次，发掘工作已接近尾声，几位从山东请来的师傅正在认真地修复陶器。王海明同志告诉我，根据墓葬随葬品的类型学排比和墓葬间的层位关系，已基本搞清了好川墓地的分期。他还告诉我，从器形看，好川墓地的相对年代大致相当于良渚文化晚期到肩头弄一期。我非常感谢王海明同志的热情讲解，使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期待着能够早日读到好川墓地的发掘报告。

现在发掘报告已经完成了，这一报告详尽地介绍了好川墓地发现和发掘的经过，墓葬形制与葬俗，随葬器物的种类、数量、组合及出土位置，并对这些器物作了仔细的描述。在进行了大量的科学工作的基础上，报告提出了墓葬的分期和年代。最后两章分析了好川墓地的文化内涵和特征，并论述了这一文化和周邻文化的关系，内容非常丰富。王海明等同志根据好川墓地的文化面貌和特点，认为这是一种新的考古学文化。他们将好川墓地类型文化遗存命名为“好川文化”。虽然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命名有待专家们的公认，但这一意见对推进浙西南及其邻近地区的史前考古研究是有积极意义的。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来涌现了许多年轻有为的专家，他们勤奋工作，对浙江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借写序的机会，我祝愿他们取得更为卓著的成绩。

2001年4月16日

于杭州弥陀山



序 二

石兴邦

好川墓地，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同志于1997年在该省遂昌县岭头岗发现和发掘的，这是近年来，在浙西南地区发现的最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存。当时《中国文物报》曾作了长篇的报道，引起考古界朋友的极大关注。1998年秋，我参加了在宁波举行的海峡两岸学者河姆渡文化学术讨论会后，和几位同志参观了好川墓地的发掘现场和出土文物，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我们觉得这是十分重要的发现，希望赶快把资料整理出来，公诸学林，这对东南地区，特别是对推进良渚文化后期的研究有很大的意义。浙江的同志不负大家的期望，期年而后，在参加发掘研究工作同志们的努力下，很快地完成了《好川墓地》发掘报告的编写工作。在付印之前，王海明同志嘱我为报告写序，我很愉快地就接受了这个嘱托。我和浙江这块地方有较深的情缘，我不是依恋杭州的天堂美景，也无暇欣赏钱塘遗韵的莺歌燕语，但是我在这里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一段时光，最富有意义的是，我从这里走上了考古之旅的人生征途。这里有我崇敬的老师前辈和志同道合的同窗好友，还有奋搏于考古工地、不断取得成果而且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的青年同志和朋友，他们取得的每一项重大发现和成果，我都由衷地感到欣慰和庆幸，这里所举行的海峡重要学术活动我都参与，并深有感触地为这些发现和成果对考古事业的重大贡献和受到重视与赞誉而欢呼！于是，走笔疾书为世纪之春的这一重大学术成果的显世而抒祝贺之忱。

—

1998年秋，我们参加了由国务院台办和浙江省台办联合召开的海峡两岸学者河姆渡文化学术讨论会，会议结束后，承浙江省领导和同志们热情、美意和优遇，我和吴汝祚、曾骐、张之恒、吴绵吉等几位老友在王海明等同志的陪同下，去好川墓地参观考察。早晨由杭州出发，费了7个小时的行程，才到遂昌县治。遂昌虽是偏在山隅的小县，却是汤显祖的名著《牡丹亭》的诞生之处，其史迹风韵，烁烁犹存，给这里增添不少人文历史气氛。好川文化遗存的发现，使这里的历史赋有了更古老文化承传的光辉。

PDG

到遂昌后，我们先去好川墓地现场考察。到达现场，始知这一带山川形胜的生态状貌。遂昌是典型的山区县，是畲民散居的地区，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喻，可知其生态文化的独特之处。好川墓地就屯栖于距县城西南 12 公里的畲族自治乡好川村的岭头岗，附近属山间低谷丘陵地貌。墓地坐落的岭头岗，是高于谷地约 31 米的谷间低丘，岗顶平坦，平面呈西北东南向的鞋底形，面积约六七千平方米，前临忠溪，背倚白马山，东迎日出，西送日落，用几分堪輿之术的理念来说，确实是风水宝地。好川先民把这里作归宿之地是绝好的选择。这个岗顶已开辟为茶园和野菊米种植之地，墓地集中分布在中、东部。这里与其他谷地比较是较为开阔的一个谷地，附近森林密茂，雨量充沛，动植物资源相当丰富，在古代当是一个丰富的生活资料采集区，是鲜明的农耕与采猎兼具的生态文化区。好川先民能在这里经营聚落也是得地利之宜。

考察了发掘现场后，我们到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参观正在展开整理的出土文物。这批标本，是丰富而完整的一群文化类型品，一下便吸引了我们。看了后，确有“似曾相识又相逢，仔细端详也生疏”之感，因为这是东南地区各文化类型同源异型、互相融合而形成的文化丛体，既有生态文化的共相，又具有自己独特之处。其类型和组合形式令人耳目一新，初次晤面即深感它的存在和面世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二

通过考察、检视标本，使我们对好川文化遗存有了一个感性的认识，并对它的内涵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所以这次我对寄来的《好川墓地》报告书稿，就不十分生疏，便如饥似渴地全面仔细地、认真地阅读一遍，部分篇章反复解读。这是我阅读报告投入心力较多的一部，深感这是一项很好的科研成果，是考古园地中独秀不群的丰硕收获。

《好川墓地》分上、下两篇，详尽如实地报告了好川墓地发掘的 80 座墓葬的全部材料，并对典型墓例和随葬品的形制作了重点论述。同时作者对好川墓地反映的文化内涵、面貌与周围诸文化的关系和联系，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论述和对比研究，提出了“好川文化”这一值得重视而富有创意性的科学命名。在报告本身的编写体例、结构及论证方法等方面，均有许多创新，真正体现了田野考古报告的真实性、学术性、科学性和可读性的严格要求，具有超越世纪的新水平。所以《好川墓地》的出版是考古界值得庆贺的一大好事。

读者从报告的阅读中，不仅可以享受到作者提供的丰美的科学成果，也会体验到收获所赖以取得的正确理论导向和科学方法：

（一）作者是从唯物史观的理论原则出发，把好川墓地材料当成当时社会历史文化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加以考察和研究的。作者认为，内涵中的各种迹象和文化类型品所蕴

涵的各个层级和方面的信息，既反映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结构的一些迹象，也一定程度表现出生产生活状况，及与其相适应的观念形态，以及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工艺技术方面的信息。同时也认识到考古资料在研究社会问题方面的局限性。因此，他们首先以遗存为依据，对墓葬本身的资料，从多层级、多元结构的角度，作了整体的、个案的和综合的研究分析，得出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首先他们把 80 座墓葬材料当成一个整体，全面系统地作了考古学的基本研究和分析，下了很大的功夫。从社会史文化因素和多元元素的分析对比中，依其形制特点、规模大小、随葬物的品类数量和性质等，将墓葬分成五类，每类都有相应的内涵和特征，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定位，同时对每类墓葬作了典型示例，得出墓主人的社会地位与其在墓地中的分布位置是相关的，墓区的布局也显现了好川族群社会形态特质的结论。

作者根据这些墓葬中的典型葬制，进一步作了扒梳稽考和断代分析，将其发展演化分为五个时期，其中第三期和第四期均分前后两小段。从分期与分布的总趋势看：第一、二期处在发达时期，墓葬坐落在葬区的中心部位，中后期逐渐衰落，多处于周围边缘部位；典型的特点是甲、乙、丙类墓，各有长宽比约 3:2 的长方形墓坑，并有井字形结构的木质葬具，总数达 63 座之多，为其他聚落墓群所少见。

（二）好川文化内涵的重要部分，是大量的随葬文化类型品，作者用了差不多二分之一的篇幅进行研究分析。作者采用文化因素分析的方法，将一千多件标本，作了全面的分析研究。从理论上说，文化内涵有其独特性和广延过程的包容性，代表了该族群的文化创造及其与他族交流、融合而形成的文化丛体，运用这个方法能够剔掘出底层的蕴涵成分与变化，能够获得该文化内涵中最本质性的东西，便于掌握其特点和规律。

从这一理念出发，作者将所有文物标本，按单位和层级，定质、定系、定性和定量地加以类分，然后，严格地按照标型学的规范，进行个案的、集群的或专题的分析研究，达到全、真、细、实与史论的统一。对每个文化因子观察入微，描写细腻、详实真确，朴实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经过反复观察和揣摩而形成的这种思维成果，会对读者有很大的启益。

作者对各类标本，以典型单位（墓葬）和典型集群（类器区分），作了整合对比，从分类和型式及表列中可以看出作者付出艰辛的劳动和心力，对类型品的分合排比，尽可能地突出其形态特点、演变过程及变化规律。对整个器物集群的组合变化，每个器物的形态变化，以至每个器物的部件的消长变异，都作了观察记录，由渐变到质变，由微变和显变以至突变，特别对典型器物和标志性的部件方面尤为着力，确实在细微处下了功夫。如果细看其变化和论述，加以检视，每一个论点都是有据可信的。譬如：占二分之一数量的陶豆，是典型器类之一，作者将其分成 9 型 35 式；带有族群标志性的典型器物鬲，是带有融合性的器类，它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但它很快被好川文化借鉴

吸收并融合成为自身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且一直存在并形成自己的发展序列，分了2型8式。这些器类的分型分式，因其有据而符合规律，使人看了觉得详而有序、细而不繁、层次清晰、异同有致，可以提供出任何型式和变化及相关问题所必要的资料 and 依据，说明问题较为周衍合宜，得出的结论也较为准确可靠。对好川墓地特有的几种文化类型品如玉器、漆器、嵌有玉片的亚腰形漆器，带有三重台阶玉片装饰等富有意识形态和族群标志性的的重要标本，作者作了重彩描述，对其寓意作了深层次的探讨，读者细读深思，当能从中获得重要的历史信息和教益。

(三) 从文化类型品的分析和认知中，好川墓地发掘研究的主要成果之一是我在前面已提到的，作者提出“好川文化”这一富有创意性的命名。我觉得由文化因素分析、与其他文化的对比以及其生态特点等方面考察，其作为一个考古学文化还是可以成立的，作者并将这一文化的主要内涵，在文化面貌、特征的章节中作了较为科学的表述，这里仅就其要者作一提示：

1. 墓葬形制多为近方形墓坑，并多用井字形的、底盖俱全的木质葬具。

2. 随葬品的主体是陶器，作者将其分为三组，合成一个具有特点的陶器群，这三个组分为：A组为鱼鳍形足鼎、双鼻壶、宽把杯、三鼻簋、尊等，B组是釜、三足盘、鬻、盆、三喙罐、盂、豆、杯等，C组是条纹圈底罐、圈足罐和曲折纹圈足罐、圈底罐等。这三组是带有时代早晚的不同组合，含有发展演化的形迹。这些陶器中，其中有若干具有良渚文化的因素，但从整体发展上看，并不能归入良渚文化范畴之内，因它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像陶鬻有较长的演变系列；型式复杂多变的陶豆，也不同于齐、鲁、江、浙同期文化中的形制；圈足盘也不同于太湖流域和长江下游的盘；大量三足盘的出现，有替代陶鼎的趋势等等。这些都显示好川的陶器有自己的集群和独特的发展道路和规律。

3. 作者敏锐地发现好川晚期陶器中，出现了少量的拍印条纹、曲折纹陶器和青灰色硬陶器。这个发现很重要，上述现象应属几何印纹陶的滥觞。

4. 好川文化有一批玉器，除保留良渚文化风貌的（也有所变异的）锥形器外，不见其他琮、璧重器，却出现了一种镶嵌或粘附在漆器上的形状和大小不同的几何形曲面玉饰片，其中侧鸟形和被称为“祭坛状”的三重台阶形玉片，是初次面世的组合饰物，寓意深刻，弥足珍贵。

5. 好川文化最有典型意义且富特色的遗物是亚腰形或圆柄状的漆器，它是采用木棍或圆形有机物，涂漆装嵌上上述玉饰片，这种器物放置在墓主人头部上方，出在较富有的23座墓葬中，这应是好川文化更具有观念形态独特寓意的标志器，是较特殊的象征权威性的器物。

6. 作者根据文化类型品的标型学研究及墓葬间的打破叠压关系，将基地的历史时

段和绝对年代作了界定：依据二期陶器在雀幕桥遗址出现的 ^{14}C 年代测试数据，作为好川文化上限年代的参考值，推断好川文化的时界距今 4300~3700 年，前后积年约 600 年，约相当于良渚文化的晚期到马桥文化初期，这基本上是靠的。

从浙江同志掌握的有关好川文化的分布的信息，仙霞岭南北两翼山地（包括建德、江山和遂昌等县市所辖的山间丘陵谷地）是好川族群活动的范围，相对而言它是百越先民系统中的一个较小的文化系区，我们可以称它为仙霞族群，也应该是我们所说百越先民的种姓之一。目前仅有墓葬材料，聚落遗存尚未发现，今后需要在上述地区寻找聚落遗址，当会有更生动和有价值的材料加以充实。

三

好川文化的发现，并与周围诸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的又一重要意义，是探索出好川文化形成的过程和特点，并使周围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相应关系历史地联系起来，也使各文化的来龙去脉愈加明朗。

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展，到晚期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因各文化共同体的交流频繁，呈现出一种融合为主的倾向，在东方沿海和东南地区尤为显著，如石峡文化、薛家岗文化、青莲岗文化、山背文化等等均呈现一种共性大于个性，文化因素多重性的特点。和上述这些文化一样，好川文化也是多重性文化因素的族群，作者洞悉这一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将富有可比性特点的好川文化与其交流融合频繁的周围诸文化的关系作了比较分析，揭示出好川文化形成的过程和特点。

作者用文化融合论的观点和方法，将好川文化置于南东半壁与其相邻和相关的诸多文化族群的接触、交流和互动的发展关系中，加以广泛深刻地比较分析。这些文化族群包括：良渚文化、宁绍平原的良渚文化、青莲岗文化的花厅墓地、昱石山文化、樊城堆文化和山背文化、石峡文化和近邻的江山山崖尾遗存和肩头弄的马桥文化，作者对这些文化族群作了深刻细致的解读，几乎是对相关文化因素一个一个地作了个案对比分析。从这些熟悉的考古学文化名称和分布地区，我们可以概知这是在相同文化生态领域内所形成的独特的相当广阔的历史文化区，在这里的各个文化共同体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诸多的共性也有独特的个性。

从这些考古学文化关系的比较研究中，可以察知：

1. 在新石器时代末期，东南地区各文化共同体发展互动，良渚文化族群在其向南、向北的扩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对相关文化影响程度的大小深浅，和那文化与其中心距离成正比，距离近，文化感染浓厚，关系密切。

2. 好川文化的文化因素，程度不同地存在于以上各文化共同体中，多少不一，主

次不同,说明它们之间有着交流和亲缘关系,但其主体是以太湖地区良渚文化为主、交流融汇而成的。

3. 花厅墓地和好川文化,诸多文化相有同共之处(特别是玉饰片的类同和出现),其合理的解释是良渚文化族群向北向南拓展过程中,文化发展的互动关系导致了上述现象,良渚文化为中介和桥梁。

4. 赣江流域的樊城堆和山背文化的部分文化典型品与好川文化相同,好川受其影响,而山背文化三期的鬲这一标志性的器物,则受好川文化影响而出现,两者之间是双向互动的。

5. 石峡文化和昙石山文化内涵中,都有与好川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这是通过良渚与昙石山文化的中介纽带而联系的,好川文化中朱红彩色陶器是受昙石山文化赭黑色彩陶的影响而出现和盛行的。两者是双向互动的。

6. 广丰社山头文化遗存中的部分类型品(如鼎和镂孔装饰)是受好川文化影响,其中另一些文化因素则是互相交流融合所形成的。

7. 好川墓地墓葬形制可能受龙山文化的影响。

新石器时代中期,长江以南地区,稻作农业文化向南迁移是其发展的主流,到发展的末期(即良渚文化后期),南方和沿海地区(珠江三角洲和东南沿海)出现了向北扩展反流现象,形成南北互动的融合现象。好川文化是在这种历史趋势下形成的,我们可以这样说:大体良渚文化的后期,也是良渚文化开始衰落的时期(约在距今4500年前后),良渚文化的一支(一个鸟帑部落集群),越过钱塘江沿着仙霞岭河谷向西南扩展,到好川建立聚落并很快地与当地土著文化结合,并在与周围诸部族的交往中创造出自己独具特征的新文化“好川文化”。

好川文化的内涵及其形成特点,带有这个时期东南地区史前文化的亲缘关系及其互动融合特点,因此它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对周围诸文化而言有其广延的多重性和可比性。从这些错综复杂的类比中,使我们也得到那时这一历史进程的基本轮廓和认识。

四

好川文化的发现,给我们以启示并提出了几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问题,有的是已得到印证的,有的是需要继续探索的。

(一) 好川文化共同体的形成,给我们展示了百越族先民聚落文化的素地,也给我们提供了解开历史上百越族系形成的过程和历史底蕴奥秘的钥匙。

史载:“自会稽以至交趾,八千余里,百越杂处,各有种姓。”这一段记述的意思是说,东南沿海地区,自江、浙、闽、赣、湘、粤、黔、桂一直到越南北部,绵延八千余

里的广阔地域，是夷越系先民的部落种姓杂居的地区，大大小小部落族群，各自聚居在河谷地带，经营着互不统属而又密切联系的部落生活，形成部落方国林立的状态。这种历史事态的形成，很可能是通过类似好川文化形成的模式而实现的。

好川文化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原史时代（即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良渚时代和古史记载中的传说时代），是文明形成前夕的阵痛阶段，长江黄河两大流域的族群部分向南移植，长江中游的向珠江三角洲移植，东方沿海的由海路和陆路向东南以至西南沿海移植。

东南地区地形地貌的一大特点是多山多水，而且山脉走向多与海岸线平行，呈东北—西南走向，其间的河谷低地是利于人们南移的通路。这里山峦交错，河流纵横，特殊的地理条件使大地割裂成条状或环状分布，山间的低谷丘陵就成为人们生息繁衍的理想之乡。这里的原始居民，多从事采猎渔捞的原始经济，大体在好川文化前后，北方稻作农业部落向南迁移，他们带着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与当地族群结合起来，建立地区性的生态文化区，适应新的环境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形成一套独特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既保留适用的固有文化形态，也创造新的文化类型品。聚居于同一地区的人们群体，经营共同的社会经济生活，就构成一个文化共同体，过着部落制的社会经济生活。积年日久，就在广大的区域内，形成部落林立、各有种姓的社会形态。所谓各有种姓，是以图腾氏族或以部落组织形式的人们文化共同体。这个共同体是在夷越族群聚落的广大领域内以种姓（所聚居的地区）为单元而形成的文化丛体，好川文化族群即其典型代表之一。

（二）好川文化时期，正是我国东方先民向海洋移植的始发期，是中华民族向海洋开拓时代的开始，也是龙山期大陆文化对台湾史前文化影响最显著的一个时期。这是与良渚文化时代东南先民的南移相联系的。

根据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现有信息，太平洋岛屿的居民是东亚大陆移植过去的，其出发点是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第一次移植大约在距今 5000~4000 年，地点有台湾、菲律宾和印尼东部地区，这也正是好川文化时代。北方夷越族先民向东南、转而西南的移植之旅，从新石器时代起就不绝如缕，除陆路外，主要是海路。海路大体有两条：一是先到附近岛屿澎湖—台湾，然后再到菲律宾等地；一条是顺大陆海岸到南方沿海，并沿印度支那半岛东海岸向太平洋岛屿移植。这不是推测，而是有考古发现物（如有段石铤、崖葬习俗等）和民族学资料作为实据，所以好川时代的先民，是我国海洋事业的最早拓植者。

（三）有希望在大陆东南找到失去的兄弟族群——南岛族群的史迹。

构成我国民族大家庭的兄弟民族之一的南岛族，除台湾外，大陆已无踪迹。根据张光直先生的研究，南岛族的原始聚居地在大陆地区，更具体地说就在夷越部族活动的地

区。我想在大陆已找不到形迹的可能的原因是：(1) 同化于其他族群；(2) 迁徙到大陆以外地区。只要在大陆生活过一个历史时期，族群必有遗留的史迹。这个问题要从体质人类学和文化比较学的分析来解决。好川时代的文化和族群应该在考虑之列，她给我们提供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契机，可惜好川墓地人骨很少保存下来，无法进行人类学的鉴定。我想今后在我国南方地区包括附近岛屿的古文化遗址和葬地中进行多学科考察，或有望找到失去的兄弟族群的史迹。这就有赖南方同志的努力了。

今年3月下旬，我正在写这篇序文的时候，恰好曾骥同志来西安参观访问，我们是一同考察过现场的老友，不期而然地又遇到一起，而且他也是很重视这一发现的同志之一。我将书稿给他看，并请提些意见。他看了后，写了几条颇有见解的真知灼见，我将这些一一列入序文中的相关部分。我们在一起曾认真地讨论这批资料和报告的编写问题，很有共同语言。我们认为，好川这批材料很重要，其重要性在它的文化类型的内涵、性质和时空界区，作为单一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是可以成立的。我们觉得《好川墓地》报告编写得很好，不论结构体例还是分类表述，都是科学务实、全面系统、周衍而翔实的。单一的考古资料，在作者的笔锋下显示出有物又有人历史实际，达到史与论的统一。王海明等同志付出辛劳，下了功夫，完满地完成这部重要的学术论著，值得赞誉。对它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我们觉得它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型示范性的贡献。因为当前我国的史前考古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明的起源和形成的探索、考古文化与历史记载的整合、民族历史文化与考古发现的历史联系等成为我们探讨的主流和课题。而《好川墓地》报告的出版，正逢其时，其内涵正好这三者兼具而备于一体，是百越族系在历史、民族与考古文化等方面关系研究上的一个突破和示范，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我希望浙江的同志继续探索，扩大领域作业，争取更大成果。我也希望在其他地区和不同文化范畴探索的朋友，也一个个地取得突破和示范，中国考古学界将会出现一个光辉灿烂的繁荣局面。多元一体格局的中华文化总体结构和形象将会历史地、现实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

2001年3月下旬



序 三

李伯谦

位于浙江省西南山地浙、闽、赣三省交界处的遂昌县，历史上几乎不见重要考古发现的报道，因此也很少受到考古学界的注意。1997 年好川墓地的发掘，犹如一道闪电划破夜空，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目光，原来在这偏僻的山地小县，几千年前也曾有过自己的辉煌。

1998 年 8 月，当好川墓地田野发掘工作刚刚结束不久、正转入室内整理的时候，我曾有幸应邀去观摩墓葬出土的标本。尽管时间很短，不能一一摩挲，难以形成系统的认识，但丰富的、成组的、富有特色的新材料却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好川墓地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墓地所在地点的地理环境和墓葬分布情况分析，除少数墓葬因施工遭到破坏，大部分保存完好，是一处基本完整的氏族（家族）公共墓地。它的发现，填补了浙江省西南部浙、闽、赣三省交界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空白，为当地考古学文化发展谱系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一些重大学术问题诸如良渚文化的去向、马桥文化的渊源、相邻考古学文化的关系等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线索。当然，通过这些材料，归纳其文化特征，探讨其反映的生产、生活及社会结构等，更是发掘者首先面对的课题。

作为读者，特别是从事考古工作的读者，最关心的莫过于希望尽早公布资料，出版正式考古发掘报告。考古队的朋友们十分理解大家的心情，他们发挥连续作战的精神，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终于将《好川墓地》发掘报告摆在了读者的面前。看过这部报告便会发现，80 座墓，除了比较详细的文字介绍，每个墓都公布了平面图、随葬器物组合图和照片，个别墓葬还根据需要发表了剖视图、填土出土器物图与纹饰、刻符拓片，并附有与墓地有关的遗迹、遗物资料及必要的统计表格，基本上做到了学术界对考古发掘报告的第一要求：发掘资料全部、完整、科学的发表。这就为发掘者的继续研究和没有机会接触实物资料的研究者的研究，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任何人只要有兴趣，都可以拿这些材料进行研究工作，独立做出自己的结论，提出自己的见解，而不是只能被动接受报告作者现成的观点。20 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经过批判所谓“资产阶级繁琐哲学”后出版的一些考古发掘报告，只发表典型器物图、典型墓例、典型单

位，其他大量的所谓无代表性的非典型资料只用一份登记表或统计表交代完事，别人就很难再根据这些残缺不全的资料进一步开展研究。考古发掘报告不发表全部资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科的发展，这种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同样令我们高兴的是，《好川墓地》在保证资料完整性的同时，也比较充分的发表了报告编写者自己的研究成果，较好地体现了考古发掘报告的学术性要求。报告编写者是从发掘、整理到写作全过程的参与者，既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又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理性认识，他们的研究成果往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理所当然也最为读者尊重和关注。我没有字斟句酌全部读过这部报告，但通过粗浅学习，还是有一些初步的体会。我认为，报告依据遗存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墓葬随葬器物组合及器物形制演变规律而建立起来的好川墓地五期七段分期标尺可以成立，今后该地区再有类似遗存的发现便有了可以衡量的依据；报告关于好川墓地文化类型遗存的文化内涵与特征的概括做到了谨严、准确，基本上反映了好川类型遗存的文化面貌；报告对好川类型遗存与周邻地区同时或稍早稍晚诸考古学文化关系的分析有一定深度，基本上揭示出了其间错综复杂的影响、融合、传承、替代等历史事实，从而在更加广阔的文化背景下进一步加深了对好川类型遗存重要性的认识。

除此之外，作为考古发掘报告有机构成部分的图版和线图，也相当丰富、清晰，有助于研究者研究视角的扩展和深入，这也是应该肯定的。

新材料的发现，是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它有可能使一些学术上长期悬而不决的问题得到破解或为其解决提供有益的线索，同时也会提出一些新的需要研究的课题。而对于材料的释读，正因为其“新”，也往往会产生不同的认识。好川墓地作为一批新发现的材料，在对其年代、延续时间乃至文化性质问题上都可能会有争论，这是正常现象。通过讨论，我们的认识将进一步深化，这是可以肯定的。

2001年1月12日